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GEOFFREY TILL

21 世纪海权指南 (第二版)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COND EDITION)

[英] 杰弗里·蒂尔 著
师小芹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013032274

E815
25



GEOFFREY TILL

21 世纪海权指南 (第二版)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COND EDITION)

[英] 杰弗里·蒂尔 著
师小芹 译



北航 C1639507



上海人民出版社

E815
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世纪海权指南:第2版/(英)蒂尔
(Geoffrey, T.)著;师小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3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书名原文: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nd edition

ISBN 978-7-208-11230-8

I. ①2… II. ①蒂… ②师… III. ①制海权-研究-
世界 IV. ①E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0373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

21世纪海权指南

(第二版)

[英]杰弗里·蒂尔 著
师小芹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1.5 插页 4 字数 432,000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230-8/D·2213

定价 68.00元

21 世纪海权指南

(第二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王缉思

副主编：袁 明 朱 锋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铁军 王正毅 王缉思 牛 军 石 斌

叶自成 朱 锋 关贵海 范蔚文 罗伯特·罗斯

罗伯特·阿特 陈 昕 查道炯 袁 明

贾庆国 唐世平 梅 然 杰克·斯奈德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定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中文版前言

很荣幸有机会为拙作《21世纪海权指南》第二版的中文版撰写序言。这本书已经有好几个其他语种的译本,但能让世界上最大的崛起中海洋国家的读者用自己的母语阅读绝对是件幸事。我谨向本书的译者,以及致力于本书中文版的所有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有关海权的价值、海军的作用和本质的中文历史著述如此之少,这颇令人困惑。如果考虑到中国在陆战战略方面的斐然成就和它丰富的海洋经验,这一现象就更值得思量。中国瓷器和其他物品数百年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广泛流转,宋代中国海军一度是最强大、最先进的海军(而且拥有庞大的国防工业基础),以及数百年后郑和声名远扬的环印度洋航行,都显示与当时的欧洲相比,中国的海洋意识、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曾经是多么先进发达。

但至15世纪时,突然之间,中国主动中止了它在海洋上的探索,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陆地边界面临巨大压力。此举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实力,数十年后当欧洲国家来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时,中国无法抵挡。结果是中国丧失了它在世界上的天然合法位置。

教训显而易见,不仅是对中国,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一个国家如果忽视开发其海洋能力,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任人宰割。不仅保卫海外利益的能力会削弱,它甚至无法捍卫自己的领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似乎已经汲取了过往的教训,其民事和军事海洋能力都有了大幅提高。中国将重拾18世纪晚期它在世界上享有的地位。这一趋势也正在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展开。

但且慢,仍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海洋国家,它将拥有什么样的海军,以及这将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甚至是全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意味着要发展海权就需要作一些选择。

本书阐述了海上战略的一些基本概念,希望中国读者了解有哪些战略可供选择。鉴于中国缺少这方面的历史文献,多数概念要追溯到西方作者,但它们确实是普遍适用的。海权不是西方的创造,它适用于一切国家,而且各国均有与占地球表面达四分之三的海洋打交道的独特道路。

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还有:海权的最大价值是什么,它为何应得到各国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当然,答案取决于一国海洋化的程度。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过去缺少关于海权的战略作品是因为它的大陆属性,但此种观点越来越受到质疑。

当一国决定了海洋和大陆的相对重要程度之后,其领导人应该决定是将海权作为影响其他国家的手段还是仅仅作为保卫其眼前海洋利益的手段。如果是后者,它们的根本海洋利益又是什么?或者是,运用其海军保卫世界和平与繁荣借以立足的全球海基贸易体系,对抗各种大至国家间冲突,小至海洋犯罪活动的威胁?

按照这种方式决定了它们的海洋目标之后,一国领导人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较为棘手了,那就是什么样的海军战略和什么样的海军(就舰队结构、战舰、平台、传感器、武器,以及最重要的,人员标准而言)最能服务于上述目标。唯有如此,中国领导人才能正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海权。对中国而言,以及其他国家,这些都是复杂又至关重要的问题。通过解释昔日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选择和特定行动的后果,我希望本书能够为决策者和那些想理解他们的决策的人提供帮助。如果我们了解海洋之于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上述问题就至关重要。

杰弗里·蒂尔

2012年7月

序 言

英国皇家海军,就像许多其他海军一样,处在一个面临重大挑战的世界上。国际形势难以捉摸,根本无法预测,有时令人鼓舞,有时令人沮丧。这无疑使海军规划者面临着各种难题。

挑战之一就是海军开支越来越大。这并不是英国皇家海军一家的问題,而是全球趋势。单个平台、传感器和武器变得日益昂贵,财政难以负担。结果便是,欧洲和大部分亚太地区一直在大幅进行数量精减。虽然保留下来的优秀平台如第45型驱逐舰或者机敏级(Astute)潜艇变得越来越大,但海军的打击范围和适应能力仍难免受到损害,因为无论单个平台的威力有多大,它毕竟只能一次出现在一个地方。

重申一次,像其他大多数海军一样,英国皇家海军的部队规划部门处于分裂之中,一方面是满足大型作战行动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满足稳定行动(这虽不是一个恰当的用語,但可勉强用之)的要求。前一个要求,要求具有高端海上控制能力如深水反潜战、防空作战和弹道导弹防御,以及海基核威慑等能力。这些能力在应对可能再次出现的“对称性的”等量级对手时才有意义。后一个要求,其主要目标是非对称威胁,要求为远征行动提供服务(由海向陆投送力量、为岸上部队提供支援和后勤保障),以及与其他国家进行建设性的交往(水面舰艇和兼容性的海军工作规程)。后一个要求花费也不菲,而且它也不一定就比前一个要求花费低。真主党从黎巴嫩境内发射C-802导弹击中以色列轻型护卫舰显示了此类行动对军队的要求及政治上的复杂性。我们的美国同行近来直言不讳地指出:“持续的和平时期交往行动和在关键能力上维持高水平以保障取得作战胜利之间存在冲突。”

在这些相互竞争的责任之间分配稀缺资源是当前各国海军规划者

面临的最为困难的观念问题。

然后是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的作战需求的关注问题，你可能认为它就像个“时间紧箍咒”。杰弗里·蒂尔称之为“眼前责任的暴政”，就是说媒体和政治部门倾向于将与当前和实际行动相关的国防项目放在首位，将那些与未来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相关的项目往后放。这从两个方面冲击着海军。第一，它将破坏，至少是延缓了那些针对较为遥远的威胁的长期项目。第二，它提出了海军的效用问题，因为似乎地面部队才是当前最需要的。虽然海军的优先事务已经从“在海上”转向“自海上”的能力，但海军过去的主要贡献和它们当前的贡献不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从而也为人所忽视。这彻底误导人们认为海军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任何时候只要将一项昂贵的海军项目披露给公众或政治部门，这种感觉都会凸显。

虽然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全球体系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全球化又建立在集装箱和现代航运业之上时，客观地讲，这样的反应就比较奇怪了。正如本书所言，海基商业产生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由工业生产和消费组成的国际社会。这是一个国家与地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它们之间存在高度的经济和相应的政治依存关系。世界和平与繁荣取决于此。然而，这一体系正面临威胁。海军必须全力以赴，并与其他军种、盟国、政府和非政府部门联合起来，在海上和自海上保卫它。

但资源紧缺，抉择不易。我们对清晰的思想 and 深思熟虑的判断的需要从未如此迫切。我也像杰弗里·蒂尔一样希望本书能有所助益。

**英国皇家海军上将、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总参谋长
乔纳森·班德爵士 (Jonathon Band KCB ADC)**

第二版序言

海军齐集，大权在握。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Pt2，IV/4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我引述了亨利四世的评论来揭示我的观点。实际上，在海军的世界里，远远没有这么确定的事。过去几年间发生的事情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本书第二版尝试着给予那些更为重要的但不幸的是自那时以来仍未变得更清晰的问题多一点关注。除了一些更新和文字上的调整之外，第二版进一步探讨了决定着海军作用的国际政治背景，并新添一章以说明本书所讨论的思想是如何为当今世界的四支海军（美、日、中、印）在所有人都越来越感兴趣的某个地理空间所实践的。本书篇幅的确较长，但任何研究海权的人都深知，这一主题没有明确的边界。要全面思考这一主题，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广阔的视野。

再次向本书第一版中提到的全球现役海军官兵、学者和研究海军的人致以谢意，尽管因字数有限无法一一在此列举他们的名字。自那以来这几年间，我继续受益于诸多建议，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感谢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慷慨地给予我两个资助项目——第SG33339号和第48492号——从而促成本书面世；感谢迈克·皮尤(Mike Pugh)教授和萨拉·萨默斯(Sarah Somers)教授和她的团队协助我获得这两项资助并帮助我管理它们。在此期间我还受益于两次长时间的研究之旅。第一次是2007年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所(The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我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卓有成效的资深客座研究员生活。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海上瞭望塔。我十分感谢乔舒

亚·何(Joshua Ho)中校为我所做的安排,感谢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许多杰出学者给我的建议,他们是如此众多以至于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我想单独感谢英国皇家海军驻新加坡联络官奈杰尔·雷斯(Nigel Race)中校,海军准将(退役)萨姆·贝特曼(Sam Bateman)和保罗·米切尔(Paul Mitchell)博士,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新加坡办事处的蒂姆·赫胥黎(Tim Huxley)博士,迈克尔·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博士,伊恩·斯托里(Ian Storey)博士,和东南亚研究所(ISEAS)的维贾伊·沙空贾(Vijay Sakhuja),“亚洲反海盗及武装抢劫船只区域合作协定组织”(ReCaap)的伊藤义明(Yoshiaki Ito)和德里克·库尼亚(Derek da Cunha)博士。在新加坡期间,通过上海测量师协会*及其许多有趣的成员,我非常幸运地受到商业航运界的欢迎;赫尔穆特·泽恩(Helmut Sohnen)和亚瑟·鲍林(Arthur Bowring)帮助我与香港船主协会取得了联系。本书将全球化作为一种海洋现象的分析就受到他们的诸多启发。

第二次长时间旅行也是三个月。承蒙成绩卓著的彼得·科曾(Peter Cozen)和韦斯顿(Weston)基金会赞助,2008年,我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成为霍华德·基彭贝格尔(Howard Kippenberger)爵士战略研究讲座第一个讲座教授。在那里,我受益于与另外一群海洋事务研究者的交流,他们人数众多,此处不一一列出。我愿再次专门感谢其中的几位,他们是新西兰国防部长约翰·麦金农(John Mackinnon),海军司令戴维·莱德森(David Iedson)海军上将,托尼·帕尔(Tony Parr)准将,卡尔·伍德黑德(Karl Woodhead)和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中校,兰斯·比思(Lance Beath)博士和布赖恩·林奇(Brian Lynch)教授。他们慷慨地匀出时间给我。由于我的一个主要兴趣与亚太地区的海洋形势有关,这两次旅行对我来说都意义非常。感谢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司令沙尔德斯(Shalders)海军上将和皮特·利维(Pete

* 即位于新加坡的 TMCS 咨询机构。这是一个提供航运软件、物流和港口咨询的专家团体。它起源于上海,故名“Shanghai Surveyors Society”。——译者注

Levey)上校邀请我参加2008年的海权会议,感谢戴维·史蒂文斯(David Stevens)博士在此期间的热情招待。詹姆斯·戈德里克(James Goldrick)海军少将一如既往地给予我很多帮助。

第二版的一个重点是关注中国、日本、印度和美国的海军政策,以它们为范本分析全球海军的发展。在研究中国时,我依靠新加坡同事的帮助、与香港的一些联系,以及许多美国专家、同行的帮助,特别是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mes)、安德鲁·温纳(Andrew Winner)和吉原俊井(Toshi Yoshihara)的帮助。

在英国驻东京海军武官西蒙·切尔顿(Simon Chelton)上校出色的协调下,我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和退役的军官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讨论,包括金田秀昭(Kaneda Hideaki)海军上将,山本东四郎(Toshihiro Yamamoto),平间与一(Yoichi Hiram)海军少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东雨矢下(Yoshitaka Toui)上校,三笠(Mikasa)基金会的佐藤(Sato)海军少将。日本国防研究院的石津友之(Tomoyoki Ishizu)教授、防务研究所的林知吉永(Yoshinaga Hayashi)教授以及他们的同事使我更加了解整个情况。在英国,寺田广(Hiro Terada)上校就像以前外交部尤恩·格雷厄姆(Euan Graham)女士一样给我帮忙,伊丽莎白·居朗(Elizabeth Guran)博士和阿莱西奥·帕塔拉诺(Alessio Patalano),以及其他来自英国—日本社区的热心人也给了我很多帮助。

在几次印度之旅中,新德里的伊恩·瑞斯(Ian Rees)准将和查尔斯·阿什克罗夫特(Charles Ashcroft)上校和伦敦的辛格(J. A. Singh)海军准将帮助我与正在冉冉上升的印度海军的许多现役和退役的军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包括海军副总参谋长韦尔纳(Verna)海军上将,沃赫拉(Vohra)海军上将及其来自印度国家海洋基金会(NMF)的同事,新加坡的苏耶特·萨马达(Sujeet Samaddar)准将和阿肖克·库马尔(Ashok Kumar)上校,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浦那(Pune)*任职的拉詹·维尔(Rajan Vir)上校。贾森·阿尔德威克(Jason Alder-

* 浦那,印度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wick)帮助我得到了梅赫塔(Mehta)海军上将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重要演讲的文稿。

美国一如既往是海军发展思想的催化剂。我特别感谢声名卓著的位于新港的海军战争学院的文斯·莫奇尼(Vince Mocini)教授和里士满·劳埃德(Richmond Lloyd)教授,感谢他们安排我访问、参加会议,使我有机会、有能力参与评论制定中的新的美国海军战略“21世纪合作性海权战略”的讨论工作。英国驻美国海军武官艾伦·贝内特(Alan Bennett)准将在我访美期间给予了盛情款待。海军分析中心的彼得·斯沃茨(Peter Swartz)也一如既往地在提供思想和建立联系方面给予了巨大帮助。我从一系列讨论中受益良多。神通广大的索尔斯(Sorce)上校在美国海军建造计划问题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的罗恩·奥罗克(Ron O'Rourke),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的罗伯特·沃克(Robert O. Work)也是如此。我从国务院的克利福德·哈特(Clifford A. Hart)、洛伦·汤普森(Loren Thompson)、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唐纳·霍普金斯(Donna Hopkins)和迈克尔·库尔特(Michael Coulter)那里了解到许多基本政策。有关太平洋的部分则受惠于对檀香山的多次访问(永远是一个负担!),感谢罗伯特·威拉德(Robert F. Willard)海军上将和比尔·摩根(Bill Morgan)博士及他们太平洋舰队的同行,感谢保罗·布拉顿(Paul Bratton)博士为我安排了在亚洲太平洋中心、夏威夷太平洋大学和与理查德·奥洛朗(Richard Halloran)的有益讨论。

第二个正在出现的主题是我称为“后现代的”、今日海军最关注的事项,即保持全球海上良好秩序、同盟合作和多边反恐等等。在此问题上,过去我受益于与布鲁斯·斯塔布斯(Bruce Stubbs)和塞缪尔·尼尔(Samuel M. Neill)的讨论和他们的帮助,现在则是受益于杰出的美国海岸警卫队,以及对南美的多次访问,部分得到保罗·鲁滨逊(Paul Robinson)上校和国防部军售部门的斯蒂夫·克尔彻(Steve Kerchey)中校的帮助。在秘鲁,我得到费尔南多·卢纳·德尔卡斯蒂略(Fernando Luna del Castillo)上校和加西亚·罗马尼(Garcia Romani)的格

外关照。在巴西我受益于与鲁伊·德阿尔梅达·席尔瓦(Ruy de Almeida Silva)海军上将、费朗西斯科·阿尔维斯·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Alves de Almeida)上校和雷纳托·阿吉亚弗莱雷(Renato Aguiare)上校的讨论。乌戈·德福尔梅(Hugo Desfromes)海军上将为我第二次迷人的智利之旅提供了便利,他安排我访问2006年海军博览会,并随智利海军一起赴南极洲,那绝对是终生难得的一次经历。乘坐补给船“海军上将维尔号”(Almirante Viel)穿越德雷克海峡的风暴之旅令人一瞥真正的航海生活!非常感谢爱德蒙多·冈萨雷斯·罗贝尔(Edmundo Gonzalez Robles)海军上将、温贝托·塞纳雷加(Humberto Senarega)和佩拉戈·卡斯特罗(Pelago Castro)上校和米格尔·马森·苏亚斯纳瓦尔(Miguel Marin Zuaznabar)中校。在世界的另一边,在阿西夫·塞勒姆(Asif Saleem)准将和拉哈·贾韦德·阿夫塞哈尔(Raja Javed Afzhal)上校的帮助下,保罗·鲁滨逊(Paul Robinson)准将及其位于巴林英国司令部的参谋们,以及英国大使和美国特派政治军事代表杰德·施耐德(Jed Synder)解释了在海湾地区进行联盟行动的复杂性,卡拉奇巴利亚大学提供了有关在阿拉伯海维持良好秩序的有用信息。

我还要感谢诸多我曾教授过他们、也曾受教于他们的海军学员们,他们既来自我所在的联合军种指挥和参谋学院(JSCSC),也有我在孟加拉参谋学院、比利时、科威特和巴基斯坦定期教学时的学生,还有难以计数的在会议和工作小组中遇到的那些给予我教益的人们。联合军种指挥和参谋学院的尼克·斯坦利(Nick Stanley)上校和蒂姆·阿什(Tim Ash)准将也曾予我以帮助。特别感谢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支持,值此英国皇家海军面临激动人心,或者讲得严重一点是挑战性的时刻,他特为本书作序。

我在英国联合军种指挥和参谋学院伦敦国王学院防务研究系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虽是经过争取但仍然令人高兴,它促成了我的写作,感谢全体同事对我的体谅。我要再次提及联合军种指挥和参谋学院图书馆杰出的馆员们对我的巨大帮助,感谢英国国防学院和防务研

究系的支持团队自始至终的支持。我夫复何求！现在的任务是为国王学院新的科贝特海上政策研究中心积聚声望，并将此项研究继续下去，但我也郑重声明本书中表达的观点和任何错误都属于我本人，不代表科贝特研究中心、国王学院和英国国防学院或者任何其他英国政府部门的立场。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她对我宽容体谅，做了很多组织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陪伴我度过我的研究之旅。不过，她乐意指出这本书将献给两艘即将服役的最新战舰——“巴尼号”(Barney)和“玛莎·鲍威尔号”(Martha Powell)。我们一致希望本书中分析的那些进展能保佑它们顺风顺水。